

# 我的科大十年

(增订版)

孔宪铎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的科大十年(增订版) 孔宪铎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9

(大学之道丛书)

ISBN 7-301-07189-2

. 我... . 孔... . 香港科技大学-办学经验  
. G649 286 5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76259 号

书 名: 我的科大十年(增订版)

著作责任者: 孔宪铎 著

丛书策划: 周雁翎

责任编辑: 姚成龙

标准书号: ISBN 7-301-07189-2/ G · 1065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京大学校内 100871

网 址: <http://cbs.pku.edu.cn> 电子信箱: [zyl@pup.pku.edu.cn](mailto:zyl@pup.pku.edu.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67346

排 版 者: 兴盛达打字服务社 82715400

印 刷 者: 北京大学印刷厂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670 毫米 × 970 毫米 16 开本 17 印张 244 千字

2004 年 9 月第 1 版 2004 年 11 月第 2 次印刷

定 价: 29.80 元

---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

盗版举报电话: (010)62752017 62752033

谨以此书  
献给我的内人  
傅静珍女士

## 增订版前言

在执笔撰写《我的科大十年》的前前后后，我的直觉不断地提醒我，这本书的面世含有历史性和实用性的双重意义。有历史价值是因为在中国的教育史上，这是一所全由一大批留学生协力携手，把一所在美国举足轻重的公立大学活生生地搬到中国的大学，这是一个划时代的创举。有仿效价值是因为中国在高等教育上正大力地整合与扩招，须要借鉴世界主流的他山之石。香港科大及时地创造了一所高校能在十年登峰的奇迹。

在这个与时俱进的时代，出现了一所振翅高飞的大学。

这些都被香港科大名社会学家丁学良教授看在眼里、放在心上。他出钱买书分赠内地教育家，他出力推动内地高校自我提升。他更精辟为文讲述什么才是世界一流学府，还鼓起三寸不烂之舌到处宣扬如何能在内地建立世界级大学。

首先他积极与北大出版社联系，如何能在内地出版，否则只有香港版，这本书就没有用武之地。是丁学良教授和北京理工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杨东平教授的努力，使北大出版社鼎力支持；是周雁翎博士的努力，使这本书能以增订版及时与读者见面。

我为这个增订版增添了一章——第五章，把科大十年的经验总结之后，审视国内实情，提出了可借鉴之处，并指出行不通的地方。

希望这本书能为有雄心振翅高飞的高校提出一点点参考，是为增订版前言。

孔宪铎

2004年8月8日

于山东烟台

## 前言 科大十年有成

从书中收集的这些创校期间的历史照片来看,你就知道我写这本书的动机不会是偶然的。在人的一生中,能有机会和一大群从事教研又志同道合的人,由世界高等教育主流的北美大学院校,回到自己出生或成长的故土,来创办一所完全独立自主的大学,是多么难得!在人的一生中,能有机会和一大群同辈同行的佼佼者,从东方文化圈迈向西方文化圈,东西结合之后,再回到东方来创办一所凭借切身经验设计的现代大学,是多么的“理想主义”!

我一开头就意识到了这一历史时机的难得和可贵。因此,我一开头就想写下我个人将要经历的这项难得和可贵的际遇。本书开头第一章挑明的便是“创建科大的机遇”。这个机遇,从个人,从科大,从香港,从海峡两岸来说都是千载难逢的。这个难逢的机遇,吸引了遍布全球有归心的中国留学生,回到香港,同心协力,创建了中国教育史上第一所全由华人留学生所创办的大学。单单这一创举,就值得大书特书。

由这项独特的机遇和创举,带来了许多独具的特色,烘托出了“创建科大的理念”,本书的第二章就阐述了这一理念。这个理念就是顺着世界大学理念的主流往前走。这个主流的形成自有其渊源,先是源自英国,其大学理念是“教学的机构”。接着就是德国,在他们的理念中,大学是“研究的中心”。美国所具有的包容和兼并精神,是把这两个分支合并为一主流。毫无疑问,美国今日的大学理念代表着当前世界大学理念的主流。一方面是继承了德国大学重视研究之传统,另一方面也继承了英国大学着重教学之传统。所以,我说创建科大的理念是放眼世界,就是要正步跨入世界主流。现代世界上研究型的大学,多有三个功能:教学、研究和服务社会。为此,科大要求所有的教员既要是教学的良好教师,又要是研究的优秀学者,也要是对香港乃至中国南部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有贡献的好公民。三者合而为一，缺一不可。

很自然的，美国大学的主流理念，就成了创办科技大学的理念。大学从精神上，没有国界，没有洲界，只有世界，一个世界。

要实现这项理念，必须“事在人为”，就是“以人为本”。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要有公平的“游戏规则”。在把各项游戏规则建立之后，科大就照着这个普世的规则，到全球去请人，其实是“求才”。“求才”的精神是“Recruit the best people and keep them happy”（延聘一流人才，并使得他们快乐），这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如果说科大今天是十年有成，依靠的基石就是这种不容易做但努力去做到的精神。

当我把创建科大的机遇和理念交代清楚之后，才开始叙述“我在科大十年的工作历程”，便是第三章，也是这本书的主体。在这一章里，我首先解说了加盟科大的心路历程，是从一条人生必须走的路，转上了一条自己选择并且喜欢走的路。当然其中过程没有像说的这么容易。接着就一步步留下了在理学院院长任期内奔走的足迹，像踏在初雪上的足迹一样，每一步都是新的。

在创校的十年当中，我在学术副校长的跑道上，整整地长跑了七年，不敢说容易。我深深地相信，科大要有成就，一定要靠着人。创建科大，必须“以人为本”；找对了人，就会创造出研究的环境。有了研究的风气，成果就源源而来，有了成果，产、学、研都可兼顾。于是我把全部精力投入在“人”上，也就是在“求才”上。说到底，“人”好找，而“才”难求。也别忘了，“求才”难，“留才”更难。我的工作，都是围绕在这一连串的难上，不管是直接或间接的，很多时候是难上加难。这便是为什么在这本书里，我用了很多篇幅去描述“人才难求”和“人才难留”。我举了三个例子，一位是张立纲，一位是杨祥发，另一位是丁邦新。他们三位都是台湾“中央研究院”的院士，而且前两位又都是美国国家科学院的院士。这三位都是名家大师，在科大求才的过程中，这三位的例子最具代表性。他们都是我自己经手，都是曲曲折折，也多多少少有些戏剧性，都曾经出现过“山穷水尽”的危急，到头来又都是“柳暗花明”，每次我都会说“上天不负有心人”。

另外，我也提及了从工作中知道的许多位对科大很有贡献的

人。还有更多有贡献的人,我不知道,也就没有细说。科大十年有成,靠的是科大的每一位同事,不只是一两位,或三四位。我写这本书,也只是从某一个角度写,别人若是从另一个角度写,一定会写得和我不同。况且,我的人生体验又不寻常:虽没有读过万卷书,却走了何止万里路;睡过街头也睡过总统套房;没读完中小学,却当过大学副校长;在纱厂做过小工,也在中南海做过座上客;几十年来走遍世界各地,看过不同肤色的面孔,也听到过不同言语的声音;再因生活的折磨和煎迫,贫困和歧视,使我把眼光放大,知道个人能力有限。这些经历都影响我在写这本书时的着眼点与着墨处。我抓住我认为重要的点之后,就细致地去叙述。但是我没有忘记在结论上不要近视、斜视,要大开眼界。

无可讳言,写人最不容易,写人最生是非,所以在我计划写这本书的当初,担心自己不够小心,朋友们也担心我会不够小心,其他的人就担心我的用心,连三联书店都在担心。可是在执笔之后,我的心情开朗得好像是淡云轻风,一切都是凭借着一笔在手时的天地良心。我的良心没有要我去违心地褒任何人,更没有要我去违心地贬任何人。“直话直说”和“快人快语”是笔者的良心,也是原则。

从写人的观点来说,占篇幅最多的就是科大的创校校长吴家玮。这也很自然,他当了我七年多的顶头上司,他让我吃尽苦头,也给我享尽乐趣,他鞭策过我,也鼓励过我,他有时把我打入冷宫,到头来还是重用我。所以在我写科大的时候,笔头上处处都有他。可是在我描述他的时候,因为情节不同,有的地方写脸,有的地方写脚,介乎脸与脚之间的部位也写过,统统凑在一起,就是我所知道的吴家玮。于公于私,我会给他打满高的总分。请读者不要只看到他的一只手或只看到他的一只脚的时候就下定论。

聪明的读者可以看得出来,我和吴校长最大的差别是,我做事用理,他做事用法。很明显的是他宜于从事,我宜于为人。这也许就是有人说我和吴校长的合作是一加一居然会大于二的原因。

这本书的第三章既是主题,占有绝大部分的篇幅,而且记的又都是在我的岗位上和从我的观点上如何开荒和如何求才。在撰写过程中,我就很忠实的依着回忆去记录值得记录下来事迹,但求

千万不要沦为一笔流水账或恩仇记。好像近年来在台湾流行的回忆录,成了名副其实的恩仇记——有人写了好几本书专骂一个人,也有人写了一本书去骂好几个人。你写书骂人,大家看你沉沦。这种歪风,实在要不得。施明德先生说得对,写书不能“只有情绪,没有是非”,也不能“只有利害,没有原则”,否则就会“带坏社会”。

我在第四章里坦诚地写出了“我在科大十年的心路历程”。在我写完许多在科大的代表性的人物和他们对科大、对香港、对中国和对世界的贡献之外,我也写了自己,一个锲而不舍、屡逢知遇、好运高照的人。我在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中加盟科大,又在科大十年有成的时刻自科大退休,真是何其有幸!更有幸的是在两位绝顶聪明能干的学术副校长钱致榕和张立纲教授之间接棒交棒长跑了七年,今生以来最充实最有经验也是最宝贵的七年。退休之后,我将回到我出生的山东沂蒙山区帮助地方创办一所“临沂大学”,从此完成我一生要做三件事的心愿。在美国做完了第一件我必须做的事,在香港做完了第二件我喜欢做的事,回到山东老家去做第三件我应该做的事——教育家乡的后代,使他们能和我一样受益于教育,有机会出人头地,对社会做更多的贡献。

香港科技大学是在1991年10月2日开学的,到了2001年的10月2日整整十年。在此创校十周年之际,我谨以创校队伍一员的身份,献上这本书作为庆生礼物。在这份礼物中,用作庆祝十周年的献辞则只有四个字,那就是“十年有成”。

十年以前,大家都说科大不知天高地厚,雄心太大,壮志太高,气焰太盛,怎么能梦想和世界巅峰比高。十年以后,大家都知道,科大的纳米研究成果,被中国科学院院士们评为2000年世界十大科技成就之一。大家也都知道,科大的工商管理硕士课程被英国《金融时报》列入全世界的前50名(亚洲第一)。在十年内就有此成就,不是“十年有成”又是什么?当然,我对有人称科大的成就为“奇迹”也无异议。只是希望,这样的成就在今后会更多,不足为奇。

我描述了科大创校十年有成之路,想起鲁迅曾经说过:“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十年以来,科大的人,从早到晚,同心齐步,用两只脚,一步一步,在山水之间,走出了一条

自己之路。

从我工作的角度上看,路是怎么走的,走出来的又是什么样的路,都写在这本书里,用笔,更是用心血写出来的。能写成这本书,要谢谢所有帮助我的朋友和同事,尤其是张立纲和丁学良教授,还有我的内人傅静珍、理学院秘书陈东娜小姐和香港三联书店的蔡嘉苹小姐。

2001年10月2日

于香港九龙清水湾

海天之间

# 目 录

前言 科大十年有成 .....	(1)
第一章 创建科大的机遇 .....	(1)
第一节 创建的历史 .....	(1)
第二节 独得的机遇 .....	(4)
第三节 独具的特色 .....	(7)
第二章 创建科大的理念 .....	(12)
第一节 创校的理念——着眼世界 .....	(12)
第二节 创校的基石——以人为本 .....	(15)
第三节 创校的支柱——游戏规则 .....	(18)
第三章 科大十年的工作历程 .....	(22)
第一节 1990—1991 年——加盟科大的心路历程 .....	(22)
第二节 1991—1992 年——任职理学院院长阶段 .....	(26)
第三节 1992—1995 年——首任学术副校长阶段 .....	(55)
第四节 1995—1998 年——继任学术副校长阶段 .....	(112)
第五节 1998—2001 年——我在科大的最后三年 .....	(145)
第四章 科大十年的心路历程 .....	(180)
第一节 科大十年的风雨 .....	(180)
第二节 内外压力与机遇 .....	(182)
第三节 退休后的第二春 .....	(188)
第五章 科大经验的总结 .....	(199)
第一节 科大经验的启示 .....	(199)
第二节 科大经验的特点 .....	(203)
第三节 科大经验的运用 .....	(205)
后记 坦然走一回 .....	(210)
附录一 六十自述 .....	(216)
附录二 我为什么要办临沂大学 .....	(233)
附录三 中药现代化 .....	(237)
作者中英文编著总目 .....	(251)

# 第一章 创建科大的机遇

## 第一节 创建的历史

香港在过去 150 年殖民地的历史上，教育的发展是相当缓慢的，不够的，尤其是在高等教育方面。第一所大学是“香港大学”，建立于 1911 年，先是以医为主，孙中山先生就是在那里习医毕业的。在所有殖民地政策上，都以发展医、农为主，人民的开门七件事重要，医药卫生重要。英国统治香港如此，日本统治台湾也是一样。只是在香港这个弹丸之地，农业无处发展，才没有农学院。世界上没有一个殖民政策不限制法律和政治学科的设置与发展，因为一有法律学科，人民就会争取平等；一有政治学科，人民就会争取自由。在这种气氛之下，自 1911 年一直到 1963 年，整整过了 50 多年，才有第二所大学成立，叫做“香港中文大学”。“中文大学”是把当时独立分别存在的三个书院，新亚、崇基和联合并在一起而成的，其间遇到了不少的阻力，是可以想像得到的。不过用“中文大学”为名，除了用中文授课之外，又与中文学科没有什么直接关系。这一点，后来不知费了多少口舌向外人解释。又过了几乎 30 年，到了 1991 年才应时代与经济进展的要求，创建了第三所大学“香港科技大学”。这是从一大堆名字中选出来的（表 1），选的是不错。但从“第三所大学”的称谓上，你可以推算到大学的为数之少。能够数到第三，已经令人觉得知足满意。香港科技大学，顾名思义是以科技为主，但包括工商管理 and 人文社会科学。在每所大学之前都冠以“香港”两字，多多少少会让外来的人误解，以为都是属于香港大学的一个体系。

表 1 大学名称的建议

---

1. 冠以香港为名者 (23 )

香港科技大学  
香港工商科技大学  
香港中英大学  
港华大学

2. 冠以地区为名者 (14)

南华大学  
珠江大学  
港珠大学  
东方之珠大学

3. 冠以人名为名者 (34)

孔子大学  
尤德大学  
香港孙逸仙大学  
香港伊丽莎白大学

4. 其他 (69)

明德大学  
经纬大学  
三才大学  
博爱大学

---

香港的经济起飞，首先是靠加工制造，如棉纱、成衣和玩具，因为有廉价劳动力，而晋升为亚洲“四小龙”之一以后的经济发展就要靠科技了。有识的香港当局是因应时代的要求而大胆地、正确地创办了香港科技大学。在有远见的已故港督尤德爵士(1982—1986年任职)和一些社会知名人士的共同努力下，1991年10月2日，“香港科技大学”呱呱坠地。

早在1985年9月，香港的行政局就达成了要增加高校的共识。在教资会的建议下，于次年的3月决定创立一所以理、工、商为主的大学，同时决定成立一个筹委会去筹划创立第三所大学的工作。该筹委会暂时称做“第三所大学筹备委员会”，也是在未有校名之

---

摘自筹委会第一份报告(1987)。  
建议校名的次数。

前的权宜之计。两个月之后，港府就任命当时行政局的资深议员钟士元爵士为筹备委员会的主席，当时的交通司长 I. Macpherson 先生为秘书长。再过三个月之后，即 1986 年的 8 月，筹委会成员的名单就发表了。由 5 位海外教育界的成员、6 位本港教育界的成员和 7 位社会名流组成。筹委会在 1986 年的 9 月成立（图 1）。



图 1 创建香港科技大学的筹委会（1986）。后排（由左至右）：陈天机教授，施国治先生，张佑启教授，李国能先生，马中岳教授，戴贤范教授，白尔德教授，林李翘如女士，夏国栋先生，黄肃亮博士，黎泽伦先生，范耀钧教授，夏杰生博士；前排（由左至右）：潘国濂先生，张鉴泉议员，郑汉钧议员，钟士元爵士（主席），麦法诚先生，陈乃强博士，刘华森先生，吴家玮博士；缺席：麦蕴利先生

1987 年 6 月 2 日，香港赛马会捐出港币 19 亿元作为建筑校园资金。这里值得一提的是，赛马会不但捐以巨款，并且将负责建筑工作，将整个计划变成“Turnkey Project”。为了沟通与合作，当时赛马会的副主席被增聘为筹委会成员。筹委会成立了，建筑费用有了着落，以后的工作就顺利地如期进行了。

筹委会开始在所承担的任务下成立各项小组，如教学的规划与发展，校园的规划与校产的管理，校园建设与管理，建校人员，财务和聘任等，分工合作。其中有一个临时小组，就是创校校长的遴选委员会。1986 年 9 月，召开了第一次筹委会的全体大会，并公开征选校名，社会反应热烈，有超过百名以上的建议。筹委会从中选择了“香港科技大学”（The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 Technology）。接着就选择校址，他们从屯门、粉

岭、马鞍山和大埔仔四处选了大埔仔。下一步就是公开征聘校长，为了选贤与能，征募世界级的人才，征聘的网络伸展得很广，一共收到了 44 位申请、47 位提名：其中大半来自英国，有 25 位申请，30 位提名；其次来自美国和加拿大，有 9 位申请，7 位提名；再者就是有 2 位申请和 1 位提名来自澳大利亚；5 位申请和 6 位提名来自香港；另外的 3 位申请和 3 位提名来自其他国家。几经细心审核考虑，遴选委员会请了 14 位前来面试，从中选了 5 位分别来自英国、美国、澳大利亚和香港的候选人，再继续深入考虑。1987 年 9 月 21 日，筹委会接纳了遴选委员会的推荐，并上报港督，1987 年 10 月 10 日获批准，并在 11 月 5 日公布，吴家玮教授成了创校校长。

14 年以后，当我写《我的科大十年》的时候，回头看看历史，对筹委会在选名、选地和选人这三件工作上，可以说是选得“天衣无缝”。

筹委会的诸多工作中，值得一记的是一些有深远影响的决定。计划是最早在 1994 年开学，开学五年后学生达到 7000 名。结果提早了三年于 1991 年开学。但学生总数仍维持 7000 名不变。学校决定用英语教学。在学生方面，理学院 25%，工学院 40% 和工商管理学院 35%。在全校 7000 学生中，研究生占 20%。各学院院长是任命而非选举产生。这一点在香港算是创举，以符合专人专职的原则。除了各学院的系所和学生人数之外，连各院的教职人员也都在数目上有蓝图。工学院有教师 214 名，教授、副教授和助理教授的分配上为 21 54 139；理学院有 171，分配为 17 43 111；工商管理学院为 160，分配为 16 40 104，想得详细周到。在这方面，也冲破了每系仅限一位教授的英国制度。现在允许有 10% 的正教授，平均来说，每系可有三位以上。

科大能在创校不到十年，就能振翅高飞，这和当初孵化出来的良好雏形是分不开的。回头看看历史，你无法不感谢筹委会的高见。

## 第二节 独得的机遇

下面我想讲一下创立科大的良好机遇。科大之能够在短短的

十年中有如此公认的良好成绩，不仅靠大家的共同努力，还有赖于天时、地利和人和等诸多有利条件结合在一起。总而言之，创建科大是适逢其时：早五年办，迟五年办或在香港以外任何地方办科技大学，都不会有这样的好成绩。即使是香港政府今天再出同样的人力、财力去办一所大学，其成就和规模都会和科大不可同日而语，因为不会再有下面这些千载难逢的良机。

首先，创建一所大学，要有一大群志同道合的人。在同一时间内，去找这么一大群对中国和对高等教育有献身精神的人，在平时，几乎是不太可能的。但偏偏当创建科大的时候，这一大群人出现了。他们源于一个时代，假如没有 50 多年前的内战，就没有这一大群人。他们大部分都是生在内地，在内战时又都正逢童年，随着家人去了台湾，受完大学教育之后再去美国深造。在美国学业（博士）完成之后，多数在大学或研究机构从事教学与研究的工作，而且都是在自己的领域内有相当的贡献。最重要的是，他们都是心向中国，这次一有机会，就都回来了。回到香港报国，能尽报国之实，确又无报国之累。假使科大早办五年，这一批人归来的时机尚未成熟；晚办五年，又都接近退休的年龄，所以说科大赶上的还是这个千载难逢的良机。这样一个历史性或时代性的机遇，科大紧紧地抓住了。请回来了这一大批 50 岁上下留学生中的专才，成了创建科大的支柱。

再者，就是在科大创立的初期，香港教授的薪俸远不如美国，所以向国外争聘好的教授，有相当的困难。可是香港公务员包括教授的薪俸，由 1988 到 1993 年创校之初的五年中，几乎加了一倍，如果以十年为计的话，到了 1998 年，其增加的幅度是 2.7 倍，更为惊人。这些都是拜“九七”回归之赐。港府为了留住人才，一路地加薪。谁都不能不承认，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目前香港教授的薪俸相当吸引人，这又是一个难得的机会。香港在 150 年的殖民统治历史中，从来没有一次在十年里把公务员的薪俸加上两三倍，以前没有过，以后亦不会再有，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一个要 150 年才发生一次而且只有一次的机会，又被科大一把抓住了。抓住并利用着这一大笔财富，引进人才。

虽然有了一群创校的人，有了很吸引人的待遇，仍不足以办

成一所好的大学，还必须要能够招聘到一大批一流的年轻人才行。这一点谁都承认。就当科大需要这样一批年轻人才的时候，美国正好陷入了严重的经济不景气，新“出笼”的博士们，在美国很难找到合适的工作，这又给科大制造了一个难得的机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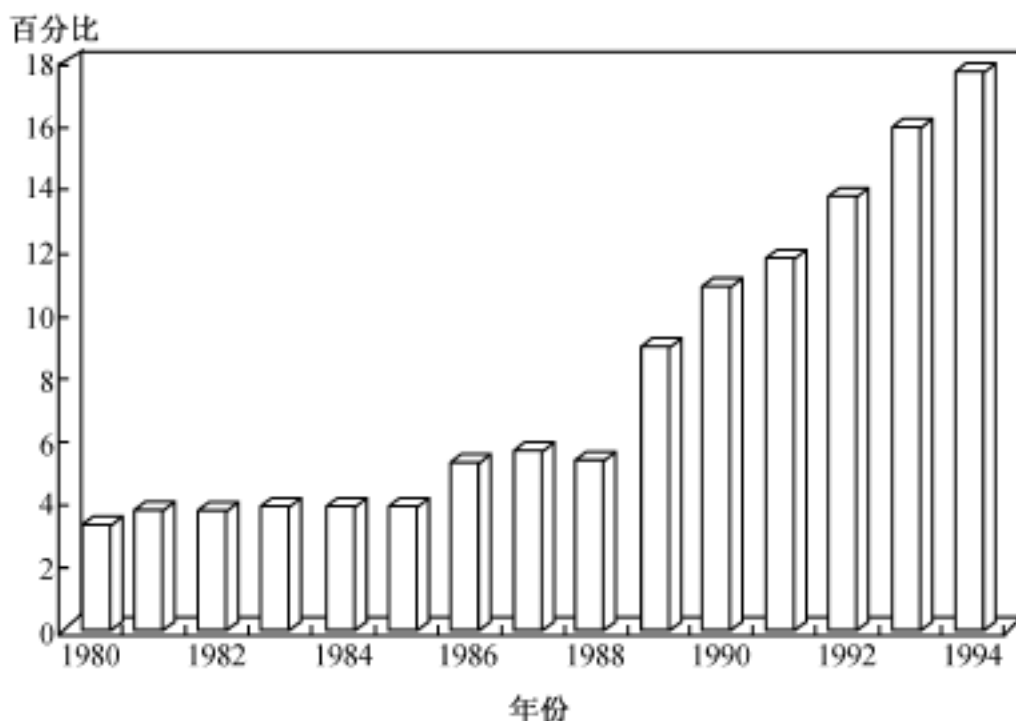
从1990至1993年，科大在美国聘请了一大批从一流大学训练出来的一流博士毕业生。从近代史上看，美国的经济不景气，过一段时期就有一次，这次正是科大创校的初期，这个时期科大每年都要聘请120位教员，平均每月10位，其中70%是从美国邀请的。所以科大把不常见的一次机会，又抓住了，请回来一批又一批青年才俊。

接着就是亚洲经济的快速增长以及“四小龙”的形成及其优越的表现，吸引了大批有成就的中国留学生回流到香港、台湾和新加坡等地，这种趋势消除了以前留学生回归时在心理上的许多障碍。此外，香港的经济快速起飞，多靠中国内地近年的改革开放和经济繁荣。内地的进出口多经过香港，所以内地近年来在珠江三角洲特区的经济发展，使香港的经济突飞猛进，水涨船高，香港变成在国际上非常突出而吸引人的大都会。从以前只供观光购物的港口，变为成家立业的城市。这个机会也被科大抓住了，抓到了一颗闪耀多色光彩的明珠。

香港政府对高等教育及科研的投资，近年来大量增加。在80年代，18岁到22岁适龄大学生的人数只有3%，目前已增加到18%（表2）。研究经费亦从十多年前的零，增加至今年的四亿港元。就以建立科大的费用为例，这在当时可能是全世界高等教育的一次最大投资。这个机会，科大又遇上了。抓住了时间，也抓住了金钱。

香港不仅为中西文化交流之地，更是中西文化混合之区。回港创业的侨胞，家眷来到香港，不必费力，即能适应。而且在近百年来，从来未有像现在这么好的回国创业之良机。回国人才来香港定居，较之定居内地或台湾都容易在文化上适应。因为内地和台湾都是百分之百的东方世界，香港不是。香港是东方和西方各占一半。这个优点，也为科大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吸引人才的良好机会。这批人才中的一部分，都已走上成功的创业之路。科大

表 2 在香港 17—20 岁青年就读大学的百分比



抓住了不但是使人才回流的立业机会，更抓住了使人才回流的创业机会，不要忘了，立业和创业的不一定是同一批人。在这两批人才之中，科大成了他们向往的中心。

以上这些重要的条件，都对创办一所世界级的大学有决定性的贡献。这些条件在历史上很难重现，即使是可以重现，亦绝不可能同时出现。所以我觉得科大的创办，是名副其实的“应运而生”，是名副其实的受益于天时、地利以及人和的天之骄子，别的大学很难碰上这么好的机遇。

### 第三节 独具的特色

香港科技大学，不论是从建筑的外表上，还是师资的实质上看，都有很不平凡的特色，我仅将显而易见的几项特色分述如下，以飨读者。

科大有一群优秀的师资：我们一开头就知道，要办一所一流的大学，一定要请到一批一流的教授。这既然是一所由中国留学生创办的大学，所以在留学生中的一流人才，我们都向他们招手，有的更是曾经三顾茅庐的。但即使如此爱才，亦没有能够把在留学生中的一流人才都请回来。可是我们把留学生中在某一些